

● 郝建生 杨增和 李永生 著

杨贵石红旗渠

书名题词 宋平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贵与红旗渠 / 郝建生, 杨增和, 李永生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9

ISBN 978-7-80109-656-2

I. ①杨…

II. ①郝… ②杨… ③李…

III. ①杨贵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91035号

杨贵与红旗渠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 (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 66509236(总编室) (010)66509353(编辑部)
(010)66509364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 //www. cctp. com. cn

E-mai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9. 12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 价: 69. 00元

再版前言

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考察河南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时再次强调：中原大地孕育的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继承好、运用好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党的宗旨，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杨贵与红旗渠》一书客观反映了红旗渠的修建过程，具体体现了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部生动教材。2004年9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并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伴随着红旗渠精神展在全国14个城市以及香港巡回展出，120万观众参观展览，红旗渠精神日益深入人心，该书竟至一册难求。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并与出版社商定，在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再版该书。

更让作者欣慰的是，很多读者特别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读后慨叹红旗渠伟大的同时呼吁为杨贵同志正名。1973年11月周恩来总理提名杨贵同志到公安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又主持公安部的全面工作。在那段特殊时期处理复杂局面，因遭到造谣诬陷曾使他受过不公正的对待。根据党中央领导指示，中纪委实事求是，经过认真复查于2006年3月认定：杨贵同志到公安部任职是周恩来总理提名的；他在公安部期间保护了干部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是有功劳的；在河南干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调农业部后为扶贫事业倾力奉献，做了大量工作。中央决定：改变公安部对杨贵的原审查结论，恢复

杨贵同志副部长职级，医疗上享受正部长级待遇。这对杨贵本人、对我们作者、对跟着杨贵修建红旗渠的劳模干部、对河南省、公安部以及所有关心杨贵与红旗渠的全国读者，都深感欣慰！

本书再版之际，德高望重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欣然挥毫为本书题写书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任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同志拨冗为本书作再版序言，我们深感荣幸并由衷感谢！

本书初版《后记》曾说：“一些未及走访的中央部门及河南省委老领导都希望作者前去走访，更有许多关爱杨贵的工人、农民抱怨作者没有找他们。”这次再版，杨贵同志几次表示：既然广大读者认可了初版版本，就不要再大改了。所以，作者只对个别文字误差做了订正，尽量保持初版原貌。同时将本书初版后对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秘书、国务院外事办原副主任程振声同志的访谈记录和钱学敏在《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发表的《钱学森的百姓情怀》及著名作家蒋子龙的《红旗与渠》，收入本书敬请读者垂注。

再版之时，我们对生前一往情深关注杨贵与红旗渠并为本书作序的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同志以及本书作者之一李永生同志的逝世寄托哀思。

河南省洛阳金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董事长柳向前热心资助本书再版，我们深表感谢！对安阳日报社党委和甘良东、王新喜、王楷德、王建增、梁吉超等同志的宝贵支持表示感谢。

祝愿本书主人公杨贵同志健康长寿！

但愿更多的读者能喜欢这本书，从中受益。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作者

2010年12月12日于北京

注：本书所用红旗渠纪实照片及封面照片均为魏德忠摄影，其它资料照片除署名外由杨贵提供。

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正英谈杨贵与红旗渠

钱正英在1993年出版的《我和我的师友们》一书中的《共产党的好书记》一节写道——

去年我去河南省查勘时，听说那里传诵着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位书记是：兰考县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

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已是家喻户晓。杨贵同志的名字虽然不为大家熟悉，但他所领导修建的林县红旗渠，却名闻全世界。我在1956年第一次去林县时，红旗渠尚未修建，人们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缺水的悲惨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人们告诉我们，一个村里新来的媳妇，因为不小心碰翻了她的老公公从十里路外挑回的一担水，竟致羞愧到上吊自尽……我们几个水利工作者都低下了头。我们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红旗渠的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说实在，这是农民的首创而不是工程师的设计。这个方案是在以杨贵同志为首的中共林县县委领导下提出并组织实施的。只有他们，才最了解广大农民世代代的痛苦以及愿意为解除痛苦所付出的代价。我听说，“文革”时，城里一小撮“造反派”揪斗杨贵时，农村的老大娘们赶来，偷偷地在他的衣袋里塞满了鸡蛋。至今，杨贵回到林县，仍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人民是不会忘记带领他们走出苦难的书记的。

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秘书程振声

2005年4月15日下午，本书作者应约访问了李先念主席的原秘书、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程振声同志。下面是程振声的谈话记录：

我最近查了一下，先念主席生前对林县、对红旗渠、对杨贵仅批示就有14次（注：后又查出批示4次），我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分为三部分谈谈。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革”前，先念是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1965年11月中央准备召开北方八省抗旱工作会议，先念同志到河南调查研究。调研期间，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到上海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指示先念同志帮助谭震林副总理抓农业。

1966年1月，周总理主持召开北方八省抗旱工作会议。会后，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周总理任组长，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任副组长。先念主管河南省抗旱工作，钱正英作助手。

以后河南省委召开会议，先念同志参加并讲话。他主要针对“大跃进”以来河南干部情绪复杂，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搞得干部信心不足的问题，批评河南“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指示要在河南搞八大灌渠，方针是东南地区防涝防旱，山区植树造林，修水库，先念同志还针对干部中的思想情绪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2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北方八省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先

念听了七个地委书记的汇报，在会议上两次讲话，给大家鼓劲，提出要树典型，学大寨，学林县。他说：“林县就是全省的典型。”那时，焦裕禄这个典型也推出来了，他提出要学焦裕禄，要学林县县委，干部的情绪有了好转。

从1966年初先念同志开始接触农业一直到5月份“文革”前，他对河南农业生产做了十条指示。这些指示实际上就是林县的经验。1966年4月，先念同志给王维群写信，要树林县这个典型，抓好全省农业生产。

这是先念同志最早、最直接讲林县。

二、“文化大革命”中

“文革”中，杨贵受冲击最早，那时谁先进就先冲击谁。1966年9月21日，安阳地委红卫兵到林县揪杨贵。9月24日，中办秘书局简报反映：“安阳地委副书记焦祖涵带领干部包围林县要揪县委书记杨贵。”因为“文革”初谭震林副总理还抓农业，先念阅后就批给了谭震林：“震林同志：林县工作是搞得好的，但我没有去过。总之在全国出了名，地委一些同志这样搞法不好，并且与中央近来发的指示不符，你看后可转陶铸一阅。”

党的九大后，先念进了中央政治局。那时周总理忙，先念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林县革委会成立后，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红旗渠配套工程，工作搞得很出色。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1560期反映：“林县大抓农业不断壮大巩固集体经济。”对此先念批示：“印参阅文件，加发农业、水电、商业、轻工、化工部。”推广林县的经验。

九大后，全国形势一度趋于稳定，外交也开展起来了。1971年7月25日，外交部、外经部向国务院请示《关于同意宫石林治等人参观红旗渠水利工程等单位》。先念同志批示：“各国大使都可去参观，当然可以去，你们就可以决定。”先念又把林县这个典型推向了世界。

1971年9·13事件前，王新在林县批红旗渠，批杨贵，换班子。1972年3月12日，华国锋转来周总理关于“林县干部大换班，否定红旗渠，群众思想不通”的批件。周总理批示：“先念、登奎、国锋同志：

是怎么回事？请登奎以电话与建勋同志谈谈。”先念批示：“我也看过这份材料，并发表过意见，请国锋、登奎同志办。”

1972年6月7日，纪登奎转来群众来信简报第19期反映：“河南省林县第一书记张兴吾全盘否定该县建设成就，大讲红旗渠是假的。”先念批示：“登奎同志阅，可转刘建勋同志阅。经常接到林县群众来信，反映有人说红旗渠是假的。怪！”

1974年春，先念同志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参观红旗渠，对林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林县的感情更深了，以后，凡是反映林县的情况，他都很重视。

三、先念同志关心杨贵

杨贵1973年到公安部，你们《杨贵与红旗渠》书上讲到的先念同志与他的谈话都属实。杨贵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老干部的子女。郭小川的女儿郭林梅、郭小慧、郭小林，赵易亚的女儿赵小冬都在林县。赵易亚的爱人“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我去看望赵易亚，他告诉我小冬在林县，县委照顾很好。

杨贵到公安部是因为李震案件。我1973年11月到了国务院政工组。我们组的张牧、刘冰清参加了案件的侦破，协助公安部搞调查。李震案件中央开始认为自杀理由不足，是他杀，也审查了不少人。杨贵很快把案件查清楚了。杨贵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不容易的。

先念同志对杨贵很关心，他也不想让杨贵去公安部工作，想让他到水利部或农业部。1973年，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不让杨贵离开。杨贵是周总理提名去公安部的，开始杨贵不愿去，先念还做了工作。先念同志清楚这件事。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开展“揭批查”运动。国务院让我和纪东（原周总理秘书）到公安部了解运动开展情况，前后有一年时间。当时，纪登奎抓公安部，施义之主持公安部工作，后由杨贵主持全面工作。凌云负责清查，整“文革”时期在公安部工作的同志，公安部政治部主任马剑等许多人受到批判。杨贵觉得这样搞不合适，向我们提出

了他的意见，我们那时是只带耳朵不带嘴，只听不讲，有情况向国务院反映。我们写了一期简报，反映了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讲了对干部问题杨贵是怎么讲的，不同意打击面过大，其他同志是怎么讲的，××是怎么讲的。简报按规定只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副总理。也不知怎么搞的简报到了××手里。他开始对我们挺好，挺热情，简报一出，对我们就不满意了，点名说我们是纪登奎派到公安部的密探。有人还张贴我们的大字报，说副部长黄庆熙拉拢我们，在家里请我们吃饭。黄庆熙的爱人师源和我同在国务院政工组工作，有一天，我在国务院值班，早上没有吃饭就到了公安部。师源让我到家里，热了一碗稀饭给我吃。这就是所谓的请吃饭拉拢我们。他们对先念在公安部批回潮的讲话不满意，就趁机批判我，还贴了我的大字报。那时，他们就在下边鼓动攻杨贵，说1975年杨贵去王洪文那里汇报工作，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了。在清查组工作的陆石也给我讲过，他说杨贵来公安部后对待干部是公道的，××他们就批陆石，后来把他赶走了。

杨贵受到批判后，我们就撤出来了。后来，一批纪登奎、华国锋，××的劲头更大了。公安部的“左”比其他单位都厉害。

杨贵在公安部工作三年多时间，从受审查、给处分到恢复组织生活，整整十年。他们把对敌斗争的方法运用到党内来，这牵涉到当时中央的一个看法，如何对待“文革”中在台上的这些人。对这些人怎么看，当时是有争论的。我们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对待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如何对待“文革”中工作的同志，先念1978年、1979年都有讲话。他说：“那个时候你能不工作吗？人民要饭吃，国家要建设，如果都不工作，难道把权都让给‘四人帮’！”

批杨贵是在大的背景下发生的。还有一个原因，“文革”中被批打下去的一些老同志对台上工作的同志有意见。

杨贵受到处分后很长一段时间先念并不知道。师源跟我讲了，先念才知道了。因为对副部级干部的处分，不需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给先念同志一讲，他生气地讲：“说杨贵是‘四人帮’的人，扯蛋！”

杨贵给先念同志写信，先念批过几次。看起来，先念的批示较模糊，因为他亲自给宋平都讲了。先念很关心杨贵问题的解决，凡是杨贵的信件和林县的材料，我们都给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认为，杨贵的贡献是很大的。“文革”中周总理派他到公安部工作，很快查清李震案件也是有贡献的。他对处理杨贵不赞成。王震和先念都是坚持这个观点。他们一心想保杨贵，但在一股风吹来的时候，挡不住。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我们党是有教训的，杨贵的问题该解决了，总会有解决的时候。

先念为恢复杨贵的副部级待遇，1988年即作过多次批示。1991年，他在李友九信上还批示说：“杨贵不是‘四人帮’的人。”

我整理了一份《李先念对河南林县和杨贵同志问题的有关批示》，送你们一份。

本书作者：杨增和 李永生

2005年4月15日



程振声（左）与作者杨增和（中）李永生（右）

钱学森的百姓情怀

钱学敏

我亲爱的堂兄钱学森怀着对祖国人民深深的眷恋之情，静静地走了。他对祖国人民的这份情、这份爱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圣火，始终在他胸中燃烧，并化为壮我中华、富我民众而奋斗不息的力量。中国今日之强大是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英杰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连日来，我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多少话不知从何说起，暂以一段往事的回忆，聊寄我无尽的哀思。

钱学森非常钦佩那些不等不靠敢于与贫穷落后做斗争的普通百姓，我时常见到他每谈起这些事情就心潮起伏，极为动情。记得那是1994年2月的一天，北京乍暖还寒，钱老约我们几个人来到他的身边。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就和我们谈工作、谈学术、谈他正在思考的一些艰深的科学问题，所以我在他的客厅里刚一坐下，就急忙打开笔记本准备速记；没想到，这一次他老人家一开口和我们谈的竟是一座真山、一座大山——太行山。

他手指着《人民日报》上穆青的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让我们看，只见照片上的人都是用一根绳索捆住自己的腰部，吊在悬崖峭壁上，手中紧握着长长的撬杠，仿佛正在踢来荡去。我不觉为之捏了一把汗，心里想，太悬了，这人不要命啦！怎么回事？只听钱老说：“这是一篇关于‘红旗渠’的报道，作者穆青多次去太行山，他和当地农民感情很深，所以写的东西真实动人。”我知道钱老对穆青一直都很赞赏，他最喜欢读穆青笔下的“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篇。

钱老接着说：“‘红旗渠’这件事情过去咱们都听说过，昨天我反复读了这篇通讯报道以后，想了很多。你们看，林县的60万农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双手握住撬杠、镐或钎奋力劈开了太行山，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漳河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穷困面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说到这里，钱老好像又看到了林县农民们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正在奋战的情景，从而为他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提起“红旗渠”，我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这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但是，当我把目光从《两张闪光的照片》移到钱老的脸上时，我发现在他那由于过分激动而泛出红晕的脸上掠过一些倦意，好像是缺觉了。噢，他一向早睡早起，睡觉质量很高，为什么没睡好呢？我猜想可能是昨晚他读了“红旗渠”以后，思绪万千，彻夜难眠，不仅为林县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也为曾经陷入苦难的农民兄弟而动情了……

果不其然，钱老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继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任羊成，当时因为每天吊在悬崖上清除山体爆破后的险石，腰里都勒得血肉模糊了，他们就是这样不怕苦、不怕死地干的……”当我再一次盯住这两张闪光的照片仔细观看时，只听得钱老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语调沉重地说：“农民太苦了！过去林县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土薄石厚，十年九旱，吃点水都要来回攀爬几十里山路，种田当然很困难。能有糠菜半年粮，就算好年景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得这里的不少农民都得了皮肤病、‘大脖子’病、食道癌等地方疾病……”钱老的语声渐渐有些低沉。

我惊叹钱老对林县百姓的苦情竟是如此地了如指掌，禁不住自言自语地随着他说：“看来他们那儿缺碘，又长期缺医少药，唉，农民活得太苦了！”钱老点了点头，更为动情地说：“遇到大旱年景地上颗粒无收，许多农民就在这荒山野岭里慢慢地冻饿而死了。”话音未落，他

哽咽了，只见钱老抬眼望着阴冷的窗外，仿佛听到了百姓沉痛无奈的呼声，探测到人民苦难的深渊，心里十分难过，禁不住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不由得心头一颤，说实在的，钱老这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虽一向比较严肃，但也是个乐观的人，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今论古非常快乐，没想到这一天，当他老人家触摸到普通百姓的疾苦时，竟流露出如此深切动人的情怀，我一时不知所措，便慌乱地安慰他说：“现在他们都好过了，有了‘红旗渠’他们吃水种地都不愁了……”再往下，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一刻，我们都沉浸在林县农民曾经的苦海里，许久，大家默默无语。

可能是因为我曾经亲身感受到过钱老对普通农民的深情与关注，以及他对“红旗渠”精神的高度赞扬，五年后的一个秋天，忽然得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会，我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情，急急忙忙赶往天安安东侧的展览大厅，想近距离地再一次接受这伟大精神的洗礼。

展览大厅里回荡着“定叫山河换新装”的背景音乐，展厅四周布满了历史照片、部分实物、沙盘模型、录音录像等展品，谱写着林县人民在共和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里“肩负起人民重托”、“千军万马战太行”等的动人篇章。

当我认真听取讲解员讲解时，忽然发现这位老讲解员与背后展示的相片上那位抡着大锤的年轻姑娘长得很像，便禁不住冒昧地问了一声：

“你就是那位铁姑娘队长郭秋英吧？”没想到她淡淡地一笑，默认了。顿时，展厅里响起一片惊叹之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她那张黑红的笑脸上。

然后，我随着观众在林县人劈山凿渠时用的工具、穿的服装等实物之间慢慢移动着，蓦然抬头看去，喏，多年以前钱老指给我们看的那“两张闪光的照片”，正大大也张贴在展厅的北墙上！照片前有十几位观众和记者围着一个60岁上下的男子；这男子一脸英气，正在比比划划地讲着什么。这时，突然有人惊喜地喊道：“任羊成！任羊成！”我赶紧凑

上前去一看，呵，这就是全国劳动模范任羊成！我暗自庆幸不虚此行。

当我最钦佩的人忽然出现在眼前时，不知怎的，我心里特想看看他腰部的伤疤，问问他那一圈“老茧腰”是否已经长好？这时，可能早已有人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听见这位朴实的农民谦虚地对大家说：

“没什么，没什么。”他边说边快步走着。我紧紧跟着他，仔细端详他那副坦然无惧的样子，不禁暗暗地思忖，人们都说：“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而他舍身抢险十年后，仍然英姿焕发地站在这里话当年，很可能是因为他浑身是胆，阎王爷也惧他三分，不敢收留他。真是可敬可爱的人啊！

接着，我独自停留在林县农民开凿“红旗渠”的录音、录像里时，整个身心被这种为了摆脱穷困而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强烈地震撼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希望这种可贵的精神能够永远融入我的心灵，带我走向崇高的境界，因而，久久不愿离去。

直到傍晚，成千上万的观众已逐渐散尽，这时，我忽然看见从外面走进一位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着整齐的中山装，腰板挺直，精神矍铄。大厅里的几个工作人员立刻迎上前去，恭敬地陪着他顺序参观。我也悄悄地混入其中，想最后再听一遍讲解员的动人解说。没曾想，那位身着红色衣裙年轻秀丽的讲解员姑娘仰望着老人，忸怩地叫了声“杨书记！”就不好意思讲下去了。

我一听她叫“杨书记！”嘴里不觉流出了心中的话：“是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旁边立刻有个声音纠正我说：“不对，他是安阳市委书记！”我无心争辩，正在纳闷，没想到这位高个儿的白发老人很快低下头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我是原安阳地委书记兼林县县委书记。”他故意在“兼”字后面停顿了一下，说完，我们一起都笑了起来。原来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是钱老深深敬仰的老英雄杨贵啊！

我脑子里立刻回想起杨书记那句“头可断，血可流。修不成水渠誓不休”的铿锵有力的誓言，也闪现出他年轻时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蓝布装，扛着大铁镐，带领大家风餐露宿、劈山筑渠的情景。我激动极

了，好像是“追星族”遇到了自己最崇拜的偶像，寸步不离，总想从他那伟大的精神宝库中再多淘到些珍宝。

无奈，天色已晚，我只得依依不舍地走出了《红旗渠精神》展览大厅。抬眼望去，只见长安街两旁华灯初上，犹如千万朵白玉兰含苞待放，映照中南海的绿树红墙，我的耳畔仿佛又一次响起了钱老那句至理名言：“中国人很聪明，又最能吃苦，只要领导得好，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此时，我也更深切地感触到了钱老无尽的情与爱早已和这块多难的土地、英雄的人民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他能够为了使祖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苦难，使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奋斗一生，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

再版序言

陈奎元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的《杨贵与红旗渠》，是一部动人心弦的文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著作。这本书生动地记载了穿越巍巍太行山的人工天河——红旗渠的修建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以杨贵为首的河南省林县县委一班人为改变林县世代缺水的困境，带领全县55万人民奋战十年，打通太行山，由山西省平顺县将漳河水引到林县的一段奋斗历程和气壮山河的精神。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这一部反映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群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带领翻身农民艰苦创业的英雄史诗修订再版，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出版社和杨贵同志约我为本书再版作序，我深感惶恐，觉得在那些修建红旗渠、打造人工天河的英雄群体面前，自己实在是卑微渺小，没有发言的资格。本书的初版序言是新闻界的前辈穆青同志所作。穆青同志多年不遗余力地颂扬修筑红旗渠的业绩，宣扬红旗渠精神，不避风险为杨贵同志正名，从他写的序言中，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红旗渠精神。本书再版，也可以寄托对穆青同志的思念。

修建红旗渠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从1960年2月11日动工，到1969年6月全部竣工，历时十年。林县县委决定修渠，从山西省引水入林县，是三年困难的时期，后边的几年处在文革动乱年代，可以说红旗渠诞生于新中国在曲折中前进的艰难时期。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年仅32岁（1960年）的县委书记和他带领的一班人，不管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不顾头顶多大的压力和风险，始终锲而不舍，硬是在太行山的丛山峻岭中开凿出一条71.6公

里的主干渠，建成总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

当人们回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段岁月时，往往着力于那时的曲折和失误，其实，那个时期党和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顽强地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天地。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两弹一星”研制等诸多方面，进行艰苦卓绝地拼搏，在面对东西两个霸权主义的封堵和压力下顶天立地自立于世界。“红旗渠”就是那个时代一颗耀眼的明星。1971年1月大型电影纪录片《红旗渠》在全国上映，《红旗渠》的主题歌“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唱遍全国。周恩来总理称赞红旗渠是新中国建设的一个奇迹，这是由衷地赞叹。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把红旗渠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同列入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传统。江泽民总书记说“红旗渠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红旗渠精神不仅是林州的、河南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胡锦涛总书记说“红旗渠精神不能丢，一定要发扬光大，红旗渠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需大力弘扬”，他还提出“要把红旗渠精神代代传下去”。

现在，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于红旗渠那一类革命传统的记忆逐渐淡漠。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有渐行渐远的趋势，年青的一代人，对于创业的艰辛更是知之不多，这是党和国家应当关心之事。《杨贵与红旗渠》一书，为我们展现了当年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场景，再现了以杨贵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为人民无私无畏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任羊成等为代表的新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从中受到教益。

2000年10月，我由西藏调至河南省委工作，对红旗渠的往事有了较多的了解。我与杨贵同志相识较晚，但对他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事迹无比钦佩，认为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些为修建红旗渠捐躯的无名英雄和为红旗渠无私奉献的人们应当永垂青史！

2011年2月1日